

# 论唯物史观对启蒙历史哲学的双重超越

## ——以“绝对”与“相对”为坐标

吴 鹏

**[摘要]** 启蒙史学用人的立场取代神的立场,为历史研究确立了崭新的出发点,但是它把人的理性推崇至“绝对”的地位,结果导致绝对主义对历史性原则的消解。尽管德国历史主义在反思启蒙的基础上用个体性对抗普遍理性,但最终只是为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马克思恩格斯拒斥启蒙历史哲学对人的抽象理解,主张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出发来研究历史。对于历史而言,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基础性地位,但这种基础性只能在具体的相对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彰显。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在普遍原理与历史条件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和平衡,克服了“绝对”与“相对”的两极对立,实现了对启蒙理性主义和德国历史主义的双重超越。

**[关键词]** 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历史性;实践;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章编号]** 1002-3054(2022)09-0012-0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220902

### 一、引言

“相对”与“绝对”的关系问题是哲学要思考和处理的核心问题,传统哲学的“绝对意识”和现代哲学的“相对意识”都是围绕这个理论“硬核”而展开的不同理论探索。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哲学,也要在“相对”与“绝对”共同架构的思想坐标中展开相关的思辨和论证。如何在历史进程的“相

对”中寻求“绝对”,构成了不同的历史哲学要回答的共同主题。无论是启蒙历史哲学(包括法国理性主义史学和德国古典历史哲学)还是唯物史观,都致力于对这个理论主题作出科学而有效的回答,从而为人类理解社会历史提供一把理论“钥匙”。因此,当我们在审视唯物史观与启蒙历史哲学的理论关联时,就不能绕开“相对”和“绝对”共同架构的思想坐标,唯有经过它,才能清晰思考和清楚表达出问题的内涵。

**[收稿日期]** 2022-03-10

**[作者简介]** 吴 鹏(1991—),男,河南信阳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CZX007)——财产权批判谱系中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研究。

## 二、以“绝对”统摄“相对”：启蒙理性主义史学的自我逆反

通过启蒙运动，人类以理性之名对现存世界展开了一番彻底的审查：“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sup>[1]</sup>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以往的一切社会形态、国家形式和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进了垃圾堆；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系列关于自然、社会、宗教、历史等领域的新观点和新学说不断涌现出来。“启蒙史学”就是启蒙理性精神不断征服历史领域的思想结晶，启蒙思想家在批判传统历史观念的基础上重构了新的历史哲学。

### （一）启蒙史学对传统历史观念的彻底批判

封建教会史学是启蒙史学批判的靶子，启蒙史学就是在驳斥和解构神学历史观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教会史学强调上帝是人类社会历史背后的决定力量，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向的目标都是神意早已决定好了的，人类只能按照神意的安排来行动。这种虚伪的历史感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遭到了批判，人文主义史学致力于挣脱神学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眼光来看待人类自己的历史，史学研究逐渐从天国回到尘世，开启了它的世俗化进程。但是，对古典文化的崇拜、对循环观念的复活、对史学艺术效果的追求、对修辞学文风的欣赏等，都使得人文主义史学家“不大注重史实真伪，不愿研究历史理论问题，没有形成与神学历史观相对立的历史哲学”<sup>[2]</sup>。

启蒙史学继承了人文主义史学的世俗化方向，继续展开对教会史学的批判与驳斥，但这种世俗化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感觉主义有着原则上的

区别：它强调要运用理性的思维和理性的方法来审视历史的发展进程，探讨历史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的普遍规律。启蒙理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封建教会史学给予了致命一击，自此以后，“上帝死了”，理性取而代之。理性主义的迅猛生长驱散了长期以来笼罩在人类历史上空的信仰主义迷雾，传统的神学历史观逐渐消退，一种新型史学即将登场。

### （二）启蒙史学基于理性原则重新为历史立法

在批判教会史学的基础上，启蒙思想家们理解历史的立足点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他们不再如教会史学家那般从神的立场出发、在信仰的启示下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根据，而是从人的立场出发、在理性的照耀下构建历史的普遍规律和一般真理。如何在理性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一套关于历史的、清楚明白的观念，就成为启蒙理性主义史学家们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在启蒙时代，法国成为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的中心，理性主义历史观在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不断被建构和表达出来。“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是为历史哲学建立基础的首次决定性尝试”<sup>[3]</sup>，他把自己在考察各种政府形式过程中使用的“理想典型”方法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致力于寻找纷乱的历史现象背后蕴含的一般原则和动力。这种“理想典型”方法旨在说明，“所谓的共和制、贵族制、君主制和专制等政府形式，并不是各种偶然获得的属性的简单集合。这些形式中的每一种都可以说是预先形成的，是某种结构的表现”<sup>[4]</sup>。例如，各种共和制政府是“共和制典型”的具体表现，各种君主制政府也是“君主制典型”的具体表现；而这些“典型”是以一般“原则”为基础和支撑的，如君主制依赖于荣誉原则，专制以恐怖原则为基础，共和制的原则是公民的美德。通过这种“理想典型”的方法，孟德斯鸠就从具体的政府形式深入到普遍的内在准则，以此为参照，“他确信，社会的作用过程，就像结构一样，并不是个别的、无联系事件的集合或相继，而且还将显示出某些典型倾向”<sup>[5]</sup>。

所以，在历史研究中，一般原则应该占主导地位，它构成了世界上一切事物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固定不变的规律，人类历史的变迁只不过是对于这种一般原则的具体演绎。而这种“一般原则”也就是孟德斯鸠所说的“根本理性”，理性的权威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被提了出来。

紧随孟德斯鸠之后，伏尔泰继续推进史学领域的启蒙。他首先强调，关于历史的写作模式应该从政治史转向文化史，因为“政治上种种详情细节和种种计谋手段都已被人遗忘，唯有良好的法律、各种研究机构、科学和艺术的不朽成就才与世长存”<sup>[6]</sup>。所以，他注重对文化成就的考察和总结，以法律制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等文化样态为切入点来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根据。而诸种文化样态则是人类天生的禀赋即理性的外在表现，理性在具体的社会历史阶段总是“隐藏在大量风俗习惯背后”，并被不同程度的偏见所重压，“历史表明了理性如何逐步克服这些障碍，如何实现自己的真正命运”<sup>[7]</sup>。这样一来，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根据就清晰地显现出来：历史的发展着重表现为文化的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则归因于人类理性的成长，“使理性得以在经验中显现并能为自身所理解，这样一种进步便是历史的基本意义”<sup>[8]</sup>。在伏尔泰这里，理性在历史发展和史学研究中的权威地位被确立起来，成为支配和串联一系列混乱的历史材料的核心线索，对历史发展的动力、根据、标准等问题的探索和理解都必须围绕着理性来展开。伏尔泰的理性主义史学第一次把启蒙理性精神成功推广和运用到了历史领域，实现了历史研究的祛魅和启蒙。这种历史观念是启蒙历史哲学的典范，并成为启蒙时代许多历史学家共同遵循的基本纲领。此后，杜尔阁、孔多塞等启蒙史学家的见解，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对伏尔泰的观点和原理的直接继承和推进。

### （三）启蒙史学的理性主义特征及绝对主义困境

虽然不同的启蒙思想家对历史发展及其规律

的具体认识存在着差异，但是启蒙时代的历史观念在总体上却具有大致相同的特征：第一，启蒙理性史学拒斥对历史的神秘主义解释，从根本上否定长期统治欧洲的神学历史观；第二，启蒙史学扎根于古老的自然法传统，依据自然本性（理性）的秩序，致力于为社会历史确立一套普遍的、抽象的、绝对的原则和规范；第三，启蒙史学秉持一种历史进步观念，认为进步的动力来源于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和理智能力的不断提升，理性的进步就是历史的进步；第四，启蒙史学坚持用理性与迷信、真理与谬误等二元对立的眼光来看待和划分人类社会历史的过程，在启蒙运动以前，“一切都是迷信和黑暗、谬误和欺骗”“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历史的”“因为在其中没有理性的或必然的发展”<sup>[9]</sup>。

其实，这些特征想要说明的事实只有一个：在启蒙时代，理性取代上帝占据了历史领域中的至高位置，社会历史进程的相对性和多样性在理性的绝对性和同一性的统摄之下才具有意义。得益于启蒙思想家在历史研究中对理性主义原则的极端运用，人类社会历史不再是17世纪学者眼中与科学性毫无瓜葛的无联系的细节的积累，历史发展进程围绕着理性这个坚实的核心统一起来并且明朗化，呈现出一种具有普遍性、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内在秩序。

但是，启蒙辩证法认为，当启蒙理性的观念和原则被推向极致的时候，就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种自我逆反也是启蒙理性主义史学无法逃脱的命运。其一，虽然启蒙史学用“理性”消解了“上帝”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权威地位，推进了历史研究的祛魅和世俗化，但是在去神圣化、神秘化和权威化的过程中，启蒙史学又树立了新的权威即理性的权威地位，重新展开对社会历史和人类生活的奴役和统治。这里包含了一种自我否定的内在悖论：“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彻底启蒙的世界却被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sup>[10]</sup>，祛魅的过程就是重新返魅的过程。其二，虽然启

蒙史学围绕“理性”这个核心范畴回答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根据和趋势等问题，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同一性和普遍性的解释，但是这种关于人类历史的同一性和普遍性解释本身却是非历史的，因为“理性”作为永恒在场的“本真存在”是非时间、非语境的，是不断变动的社会历史的不变根源。“因而，启蒙运动的历史观便不是真正历史的；在它的主要动机上，它是论战性的和反历史的”<sup>[11]</sup>。以一种反历史的原则来理解历史，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这些悖论构成了启蒙理性史学的限度。

### 三、在“绝对”与“相对”间徘徊：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的两难困境

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启蒙运动的理论产物，而德国启蒙运动是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展开的。因此，德国哲人对于历史的理解与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有着莫大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看作启蒙理性主义传统的推进和反思，仍然从属于启蒙的范围。当然，德国哲人对于历史问题的思考使得历史研究本身变得更加复杂，这里既有启蒙理性的绝对主义立场的延续，也有反思启蒙的历史主义传统的兴起，它们共同构成了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的整体图景。

#### （一）康德先验历史哲学是启蒙理性传统的德国版本

康德仍然是从启蒙运动的精神出发来对待历史问题的，他的先验历史哲学是对启蒙理性传统的直接继承和推进。在康德眼中，历史虽然是人类行动的产物，是自由意志的表现，但却和自然一样同属于现象界；尽管历史领域中的具体事件和个体行为经常呈现出错综复杂、毫无规则的状态，但如果我们从总体上来考察的话，就会在其中发现一个自由的、有规则的过程。这种规则并不来源于上帝，因为上帝不在现象界发挥任何作用；这种规则也不来源于人类自身，作为有限的

理性存在者，人类也不可能全然依照一个商定的计划行事。“在此，哲学家没有出路，除非是：既然宏观上根本不能在及其活动中预设任何理性的自有意图，他便尝试看能不能在人类事务的这种荒诞进程中揭示一个自然意图；从这个自然意图出发，行事没有自己的计划的造物却仍然可能有一个遵从自然的某个计划的历史。”<sup>[12]</sup>康德正是从“自然意图”的目的论公设出发解释历史进程的规律性，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秘计划。

隐秘计划的实施过程就是人类理性的展开过程，因为除了赋予人以理性及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意志自由之外，大自然并没有给人以其他特殊的恩宠；大自然的最高意图就在于使人类的自然禀赋获得完全发挥，虽然这个过程中到处弥漫着人的“非社会的社会性”（如竞争、战争等），但正是这些对抗不断激发着人类理性，塑造着人类社会的合法秩序，引导着人类向永久和平的世界公民状态前行。人类理性正是在与自身非理性的斗争中不断推动着人类趋向自身历史的自然目的，这就是康德眼中的先验普遍的历史图景。这种目的论视角的历史观念对于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总体理解仍然维系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它代表着启蒙理性主义历史哲学的顶峰，同时也把人类关于人的历史性存在的自我反思推向了绝境。

#### （二）德国历史主义对启蒙理性的思想变奏及其相对主义困境

当启蒙理性传统踏入自我逆反的绝境后，对于历史变迁的绝对主义和普遍主义解释路径便被树立起“此路不通”的警示牌。以赫尔德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反启蒙之道而行之，力图在移情原则的基础上重塑人类历史进程的具体性、多样性和相对性。在德国浪漫主义批判启蒙理性史学的过程中，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生命原则和研究方法破茧而出，并成长为“西方思想中所曾发生过的最伟大的精神革命之一”<sup>[13]</sup>。“历史主义的核心是用个体化的观察来代替对历史——人类力量的普遍化的观察”<sup>[14]</sup>，“个体性”取代

“普遍理性”成为历史主义的核心范畴。借助“个体性”的概念，个人在历史中的创造性、各民族国家在历史中的独特性及整个历史进程的多样性都获得充分表征，启蒙理性史学所编织的整齐划一、死气沉沉的概念网络被冲破了。历史主义“发现的是属于某一时空的价值、魅力和内在性，或者说，他们发现了属于特定时空的东西相对于普遍物的优越性”<sup>[15]</sup>，这与启蒙理性史学所确立的普遍的、统一的、绝对的理性标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围绕“个体性”这个核心范畴，历史主义在其不断涌现的过程中生成了自己专属的概念系统，“个体”“有机整体”“发展”是架构历史主义概念系统的基本范畴。历史主义的个体观立足于单子论，认识旨趣在于个体的殊相，强调个体是异质性的。从单子式的个体观出发，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历史就不再是由无数同质性的原子式个体叠加而成的“机械整体”，而是由无数异质性的单子式个体（包括个人和集体）相互作用而成的“有机整体”。无论是单个人物的个体性，还是“有机整体”的个体性，都“只有通过一种发展的过程才能显示出来”<sup>[16]</sup>。这种发展观念强调人类历史变迁的轨迹是从一个民族或时代的精神向另一个民族或时代的精神过渡的过程，是不同民族或时代精神之间的质的变动；由于相互异质的民族或时代精神之间并不存在高低秩序，所以“发展”并不像启蒙理性史学那般是人类理性在量上的增长。

在核心范畴和概念体系发生实质性变革的基础上，历史主义为人类理解自身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原则。历史主义意味着对启蒙主义普遍性原则的质疑和反思，在反思启蒙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历史性的解释原则来矫治普遍理性的专制和霸权。这种历史性的解释原则承认并强调：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及其文化样态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事件都有其价值，所有的价值都是独特的和历史的，不能简单粗暴地运用一种抽象普遍的和绝对同一的标准来衡量历史的多样性，

要以历史性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主义试图理解过去，理解过去的制度、信仰和创造并为之辩护，这种努力使得历史主义走到了历史相对论和虚无主义的边缘，一切原则都可能在怀疑论中消解”<sup>[17]</sup>。为了阻止这种困境的发生，历史主义企图诉诸超验的“上帝”来维系历史的普遍意义和客观秩序。“在一个其价值和真理是与历史个体而不是与普遍的人类规范联系在一起的世界里，只有上帝提供了统一的纽带”，每一个历史个体都是“上帝的手指”<sup>[18]</sup>。当历史主义仍然要以“上帝”作为自己的避难所时，其理论的不彻底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 （三）黑格尔思辨历史哲学的双面作战及其理论缺陷

康德与赫尔德的争论凸显了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的两难处境，使得历史规律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难解，但问题本身不会被悬搁，黑格尔的思辨历史哲学就是继续推进这个问题的一种全新历史观念。为了破解历史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困境，黑格尔以一种两面作战的姿态登上了历史哲学的舞台。一方面，黑格尔与康德代表的启蒙理性主义传统作战，在他看来，启蒙传统对于理性的推崇只停留于抽象的普遍性之中，它把理性作为“唯一的静止的形式”强加于具体的历史进程并对其做出概括和预测，因而在这里就不再有历史自身，不再有真正的历史性，只剩下作为单纯质料的历史“杂多”。这是一种单调的形式主义和虚妄的主观主义，以理性为绝对的启蒙史学传统只不过是历史研究的门外汉，这种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是相脱节的。另一方面，黑格尔与赫尔德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史学传统作战，在他看来，这种建立在泛神论的个体性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历史主义并未切中真正的历史性，它执着于历史语境的个体性和独一无二性，试图削弱理性的普遍权威，为历史相对主义乃至历史虚无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不管黑格尔有多么‘历史主义’，但他拒绝接受其相对主义的后果”<sup>[19]</sup>。

在两面作战的基础上，黑格尔需要重新构建

历史哲学体系以超越历史研究中“绝对”与“相对”非此即彼的立场。这种新的历史观念仍然使用启蒙的核心概念，“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sup>[20]</sup>。但是，黑格尔对“理性”的规定已经超出了启蒙传统的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普遍的神圣的理性’，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观念，而是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实现它自己的原则”<sup>[21]</sup>。因而，“发展的原则”是内在于“理性”或“精神”本身的，“精神”的本质便是活动，“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sup>[22]</sup>，是“精神”从“无限的可能性”走向“完满的现实”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必须借助“人类的活动”，各种基于“利害关系”的、特殊的、私人的活动无意识地或不自觉地推动着普遍的原则一步步实现出来，这就是“理性的狡计”。在黑格尔这里，主导人类历史进程的绝对理性与特殊的、个别的人类活动相结合共同构成了历史的真理，“热情的特殊利益，和一个普通原则的活泼发展，所以是不可分离的：因为‘普遍的东西’是从那特殊的、决定的东西和它的否定所生的结果”<sup>[23]</sup>。

这也就意味着，“绝对”只有借助“相对”才能实现自身，“相对”只有依赖“绝对”才能获得意义。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作为本体论承诺，真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性原则，既超出了启蒙主义的非历史性立场，又避免了历史主义的虚无主义困境。但是，“这种理性，在它的最具体的形式里，便是上帝。上帝统治着世界，而‘世界历史’便是上帝的实际行政，便是上帝计划的见诸实行。”<sup>[24]</sup>当费尔巴哈、尼采等人宣称“上帝已死”后，以“绝对精神”作为本体论承诺的黑格尔哲学体系便轰然倒塌，其历史性原则同样面临着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

#### 四、消解“绝对”与“相对”的两极对立：唯物史观的张力及其双重超越

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分别从“绝对”和“相

对”的立场出发，构建了两幅完全异质性的历史图景，但是当它们各自到达自己的思想高峰时，同时面临着思想的绝境。理性主义所带来的是一种“没有选择的标准”的本质主义的肆虐，历史主义则引导人类走向一种“没有标准的选择”的虚无主义的焦虑。因此，如何在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寻求关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同一性，仍然是历史领域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而且，在“绝对”与“相对”的两极对立模式中，这个核心问题始终无法得到彻底回答。这些理论困难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背景，同时也是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所必须面对和解答的理论困难。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历史哲学的总体性批判

在构建“历史科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对“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进行了批判。概括来说，批判工作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以往一切历史观的观念论立场。无论是以无肉身的“普遍理性”为核心范畴的理性主义史学，还是以“上帝存在”为避难所的德国历史主义，亦或是以“绝对精神”为根据的思辨历史哲学，都是从某种观念出发来编排历史的规律及其意义，它们完全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使得“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sup>[25]</sup>，变成了“‘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sup>[26]</sup>。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以往一切历史观的非历史性原则。在观念论的立场上，“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sup>[27]</sup>；他们把思想与其得以产生的条件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让“思想”“理性观念”化身成为一种超历史的、永恒的根据来主导历史的发展，即便是历史主义强调的历史性原则也必须依赖超历史的、绝对的上帝

才得以可能。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以往历史观所蕴含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sup>[28]</sup>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在法国理性主义和德国历史主义共同构成的启蒙历史哲学传统中获得了显著的表现。在历史研究必须解决的“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上，二者分别坚持“绝对”和“相对”的立场，并将“绝对”和“相对”视为相互对立和互相排斥，要么片面夸大普遍理性的绝对性，要么片面强调历史个体的相对性，并将其推行到极致，分别陷入本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理论困境，这种无转化的、非此即彼的思想不可能真实反映历史进程的复杂性。

## （二）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与“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从某种固定的、先验的和普遍的概念出发来理解历史的做法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出发点的位移：“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sup>[29]</sup>。虽然从“人”出发来理解历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启蒙理性史学就是从人的本性即理性出发来解释历史，赫尔德也把“人道”设定为人类历史的目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性或先验的人道，“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sup>[30]</sup>。从“现实的人”出发来理解历史，就是要从现实的人的活动特别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出发来理解历史，这个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应该获得任何历史观的重视和认可。

围绕着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构建了一种新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学说，即唯物史观。这种历史观与启蒙理性史学、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等唯心主义历史观有着原则性的差别——“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

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sup>[31]</sup>。它意味着，历史的主体不再是无肉身的普遍理性或作为“上帝手指”的历史个体，而是从事感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历史的动力不再是理智能力的提升或个体潜能的迸发，而是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感性实践活动；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再是普遍理性的自我实现或先验人性的不断释放，而是基于人的感性活动的自我创造过程；历史的目的是不再理性的胜利或天意的显现，而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明，随着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发生位移，“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sup>[32]</sup>。

## （三）唯物史观的内在张力及其辩证本性

唯物史观运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三对基本范畴，凝练出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基本原理和普遍解释，这种一般性的原理能否被视为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绝对真理呢？的确有人秉持这样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唯物史观仿佛就是一把解开历史之谜的万能钥匙，力图一劳永逸地将唯物史观“拔高”到“一般”“普适”乃至“绝对”的地位。这种“拔高”现象在马克思在世时就已经出现，马克思曾直接对此做出回应：“我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sup>[33]</sup>，因为“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sup>[34]</sup>。在马克思逝世之后，这种理解模式仍然存在，最为典型的就是始于第二国际并在当下持续产生影响的“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他们用“唯一”代替了恩格斯所说的“归根到底”，把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还原为经济因素，使唯物史观转化为“经济决定论”；继而将“经济决定论”奉为“绝对真理”和“一般公式”，通过曲解的方式间接地把唯物史观绝对化和普适化。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对这个学说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唯物史观“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sup>[35]</sup>。这个论断从来源和用途两个层面对唯物史观做出了精确的定位。从来源层面看，唯物史观作为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性原理，并不是纯粹脱离感性经验的先验之物，而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种概括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超历史的绝对真理，而是会随着人类生活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而有所发展的历史科学，而且只有在人类历史不断展开的进程中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创造性的发展，才能够确保这门历史科学的科学性。从用途层面看，唯物史观绝不是随处套用的、现成的公式，而只能作为一般的指导性原理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帮助人们在一系列具体的、个别的历史事实的汇总中建构历史的内在联系，使具体的现实经过思想的抽象上升为思想的具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对唯物史观做出如此定位，其根据就在于“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这个理论基础所具有的复杂属性：一方面，现实的

人的感性活动是一切人类历史得以展开的现实基础，在历史研究和阐释过程中具有一般性和基础性的地位；另一方面，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不是一个先验的、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的、历史的活动，只有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够展现其具体的内涵和意义，所以它是历史的和具体的。对于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而言，最重要的是在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展开具体的历史研究，但绝不能用一般性的原理来替代对于每个时代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深入研究。只有在普遍与特殊、绝对与相对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平衡和微妙的张力，我们才能够真切地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在人类历史自我理解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 五、结语

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既不是纯粹标榜绝对真理和普适原则的“绝对的绝对性”，也不是完全放弃一般原理和普遍标准的“绝对的相对性”，而是着重强调普遍原理与历史条件之间相互确证和辩证统一的“相对的绝对性”。这种历史学说不仅超越了历史主义传统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而且摆脱了理性主义传统的绝对主义和本质主义倾向。作为一种辩证的历史观念，唯物史观消解了绝对与相对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对启蒙理性主义史学和德国历史主义观念的双重超越，既是彻底的历史意识，也是批判的历史科学。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人民出版社, 2009: 523.
- [2] 赖元晋. 18世纪启蒙史学的地位和贡献[J]. 历史研究, 1991(4): 156-167.
- [3] (德)E·卡西勒著, 顾伟铭等译. 启蒙哲学[M].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203.
- [4] 同[3], 第204页.
- [5] 同[3], 第207页.
- [6] (法)伏尔泰著, 吴模信、沈怀洁、梁守锵译. 路易十四时代[M]. 商务印书馆, 2019: 496.
- [7] 同[3], 第214页.
- [8] 同[3], 第214页.
- [9] (英)R. G. 柯林武德著, 何兆武、张文杰译. 历史的观念[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91.
- [10]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著, 渠敬东、曹卫东译. 启蒙辩证法[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1.
- [11] 同[9], 第88页.



- [12] 李秋零主编. 康德著作全集(第 8 卷): 1781 年之后的论文[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5.
- [13] (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著, 陆月宏译. 历史主义的兴起[M]. 译林出版社, 2010: 前言第 1 页.
- [14] 同[13], 前言第 2 页.
- [15] (美)列奥·施特劳斯著, 彭刚译. 自然权利与历史[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16.
- [16] 同[13], 前言第 4 页.
- [17] (意)卡洛·安东尼著, 黄艳红译. 历史主义[M]. 格致出版社, 2021: 12.
- [18] (美)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著, 彭刚、顾杭译. 德国的历史观: 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M]. 译林出版社, 2014: 87.
- [19] (美)弗雷德里克·拜塞尔著, 王志宏、姜佑福译. 黑格尔[M]. 华夏出版社, 2019: 35.
- [20] (德)黑格尔著, 王造时译. 历史哲学[M].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8.
- [21] 同[20], 第 33 页.
- [22] 同[20], 第 66 页.
- [23] 同[20], 第 30 页.
- [24] 同[20], 第 33-34 页.
-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人民出版社, 2009: 545.
- [26] 同[25], 第 541 页.
- [27] 同[25], 第 552 页.
-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M]. 人民出版社, 2009: 24.
- [29] 同[25], 第 525 页.
- [30] 同[25], 第 524 页.
- [31] 同[25], 第 544 页.
- [32] 同[25], 第 526 页.
- [33] 同[1], 第 466 页.
- [34] 同[1], 第 467 页.
- [35] 同[25], 第 526 页.

## On the Dual Transcende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ver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 Based on the ‘Absolute’ and ‘Relative’

WU Peng

**Abstrac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marked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by establishing man’s position over God’s, but it highly praised human rationality to the extent of “absolute” status, which led to the negation of historical principle. Although German Historicism used individuality to fight against universal rationality based on the reflections on the Enlightenment, it only ended up opening the convenient ways to Relativism and Nihilism. Marx and Engels rejected the abstract understanding of human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 and advocated that historical research should start from the view of “realistic man”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For history,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the “realistic man” possess the fundamental status in the absolute sense, but the significance are only manifested during the specific and relative historical process. The dual transcendence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sm and German Historicism can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d on practice, which maintains the necessary tension and balance between universal principle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overcomes the opposition of the “absolute” and the “relative”.

**Keywords:** absolutism; relativism; historic; practi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